

HEZHIWU
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和志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和志武◇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和志武◇著

HEZHIWU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和志武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志武纳西学论集 / 和志武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12
(纳西学丛书 / 白庚胜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09099 - 0

I. 和… II. 和… III. 纳西族—民族文化—文集
IV. K285.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401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 //www. mzcbs. com](http://www.mzcbs.com)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20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3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099 - 0 / C · 269 (汉 24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辑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科院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

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麼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璧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纳西学已经产生《麼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麼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璠、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原、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

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品正、牛耕勤、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我们也可以由此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之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的存在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列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士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其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刘永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和苏州市蔡琨先生、庞欢先生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饱受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

于北京寓所

序

任继愈

中华民族中的 56 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传承。各个民族，不论人数多少，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宗教信仰及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贡献，各具特色。在几千年长期共同生活中，互相交流，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从而得到共同发展。古人所说，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正是指的这种情况。

再从横向来考察，每一个民族都和周边地区的社会群体发生交往。经济交流可以互通有无；文化交流（如文学、艺术、建筑、绘画）可以丰富生活、开阔视野；政治交流，可以增加信任，维护和平、稳定；地区之间的交流同样可以互相补充，双方受益。

民族传统历史研究与地区间研究，纵横交叉。开展研究，形成综合、系统的考察，必将贯彻我国民族文化、历史的研究，并将其推上新的台阶。

纳西文化研究，开了一个好头，成绩斐然。我国有不少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做了类似纳西文化研究的工作。山东有齐文化研究，湖北有楚文化研究，陕西有三秦文化研究，山西有五台山文化研究、晋西南有华夏古文化研究，安徽有徽文化研究，浙江有天台山文化研究，东北三省有萨满教文化研究，河南有少林

寺文化研究。这里只是随手举例，并未详细统计。这些研究侧重点不尽相同，有的从宗教文化入手，有的从考古资料入手，有的从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入手。不论从哪一点切入，都归结到文化深层的认识。各个分门别类的研究归总起来，对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集腋成裘，积锱铢为丘山。只有对每一个兄弟民族的研究深入，有所创获，才可以写出更完备的中华民族文化史。

在众多地区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中，纳西文化研究贡献突出，成绩斐然。和志武同志的文集就是明证。通过这部文集，我们看到了纳西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还要在已取得的成绩上更进一步。比如说，我们前些年抢救译出了上百部东巴文献资料。当时为了抢救翻译，来不及仔细推敲，力求保持原著的原貌，采取了四行译法。先如实地把读音记录下来，逐字对应地译出，最后写成译文。东巴文字难于识别，不同地区的经师师徒口耳相传，各有不同的传承。今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还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参照相近的文献资料作进一步的推敲，还有不少工作有待后人继续深入。这些困难是我们研究已死去的文字时共同遇到的。东巴文处在“绘画”与“文字”发展的过渡阶段。国外的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北美印第安人也曾用绘画来表达意义。他们对绘出表意示意图，又必须附口头解释。对东巴文作科学、确切的解读，东巴语文的语法、词汇研究，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们后来人继续发掘。

万事起头难。有一个好的开端，预示了一半的成功。我们欣慰的是有和志武这样的先行者开了路，后面更年轻的梯队可继续前进。纳西文化研究前途无量。令人遗憾的是和志武同志的事业刚刚开始他便不幸逝世，更多的工作有待我们后继者的努力。纳西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纳西文化研究得越深越透，

中华文化的研究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和志武同志的论文集具有科学性、开拓性，奠基工程已开始，并且作出了榜样。这本文集的历史价值功不可没。

祝纳西文化研究前途无量。

2002 年 11 月于北京

代自序：做学问必须做老实人

我今年已有 63 周岁，进入了老龄行列。从 1952 年初被留在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后叫民语系）开始从事纳西族语文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到 1971 年底回到丽江地区师范学校，1973 年初又调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即现在的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至今已 41 年了。根据所在单位的任务和社会需要，先是集中搞语言文字，进而研究历史、宗教和文化，但始终以学习研究纳西象形文和东巴经为根基，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先后约有 200 万字的著述，如协助方国瑜先生参订名著《纳西象形文字谱》、撰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库丛书专著《纳西东巴文化》、主编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等，为发展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91 年 10 月 1 日，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回顾过去自己所走过来的治学之路，有若干值得总结的地方，但不敢说已是老马识途，只是一点个人的体会而已。

一、打好民族语文功底是关键

任何事物的发展是与必然和一定的偶然（机遇）相结合的。我出身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黄山乡长水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位当地著名的大东巴，书、写、画、舞都具有较高造诣。我小时一面进村小学学汉语文，一面跟父亲学东巴经，自幼受东巴文化的熏陶。六年制小学（高小两年在县城省立丽中附小）

毕业后，家里供不起我继续读初中，便失学在家。为了生计，我曾到县城一家外籍商号当小伙计（帮工）。次年，家乡流行鼠疫霍乱，父亲病亡。随后，抗日战争胜利，商号关闭，我也回到长水家里务农。在家乡父老“不要丢掉祖传之业”的劝导下，我请来丽江县五台乡中和村大东巴和芳先生，邀约邻村的几位中青年农民朋友在我家办了一个学东巴经的私塾，主要在晚上学习，但由于生活拮据，维持不到半年就散伙了。这以后，为了糊口，在主要从事家里农业生产劳动之外，偶尔也受大研镇大东巴和凤书、南山汝南化村大东巴康爸才等人之奖掖，跟随他们实习东巴教仪式活动，耳濡目染，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到1949年5月正式参加中共云南地下党为止，我曾先后按古本学习写作10本东巴经。这就是我后来从事东巴文化研究的起点，也是掌握纳西古今语言文字功底的必要基础。于我而言，这点传统民族文化知识的基础，对后来走上治学之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即所谓的内因作用。当时，丽江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79年7月1号和平解放，我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小学教员。1951年春，我被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汉语文、民族政策、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程。1952年初，我被留校任语文系纳西语文专业教员，师从傅懋勳、马学良两位教授，如鱼得水，受益匪浅；同时，我和学生一起教学相长，系统聆听各种专业基础课，诸如语音学、语言学概论、普通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修辞、人类学、民族志学、语言调查常识等，边教边学，从干中学，循序渐进，教学与科研结合（编过两本教材和一部词典），理论与实践结合（指导学生下去实习一年、参加语言调查两年、进行东巴经专题调查一年），不断实践，日积月累，所掌握材料渐渐丰富，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1956年，我开始在北京《民间文学》上发表首篇东巴经译作《人类迁徙记》（收入国内多种集子并在日本发表），进而于1961年在《中国语文》

上发表学术论文《试论汉语在纳西语丰富发展中的作用》，从而走上了做学问的道路。这就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的重要作用。回顾这段历程，证明了一个真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就不会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农民到首都全国民族最高学府去深造。这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没有纳西语文的基础（即懂象形文东巴经），加上参加地下党，恐怕当时的丽江县委和人民政府也未必把我保送到北京。这又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机遇。所以，我的学术成长道路，说明掌握好一种民族语言文字（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对深入研究那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民族语文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民族语文又是民族发展的社会活化石。因此掌握好民族语文是打开民族历史文化深层奥秘的金钥匙，我就是在新中国的中央民族学院的优越条件下，经过自己勤奋的努力，掌握好民族语文这把金钥匙，才有了今天的学术成就的。当今世界的民族学界（文化人类学），一般都重视掌握民族语文的问题，但在中国民族学界似乎对此还不够重视。我认为，打好民族语文的功底，对于一个从事民族学的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外前辈著名学者方国瑜、傅懋勣、李霖灿等人，他们之所以对纳西文化研究有突出贡献，闻名中外，无不以其深厚的民族语文为功底或作突破口（即纳西象形文东巴经）。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值得后来者认真吸取。近几年来，先后有美国、澳大利亚的三四个博士研究生来华攻读纳西文化，我都坚持先上或长或短时间的纳西语文课，再给他（她）们介绍其他历史文化，然后让他们下去实地考察和进一步学习民族语文。我认为这样的路子和方法是比较科学的。

二、服从社会需要，发挥个人专长

我在中央民族学院 20 年，基本上按照学校教学的需要和国

家下达的任务集中参加民族语文教学和全国统一组织的民族语言调查。到“文化大革命”前为止，虽积累了相当的资料，但学术成果发表很少。因为当时自己的学术水平还不高，加上兼职过多（教研组长、院党委委员、代理系党总支书记），各种政治运动多，几乎没有时间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保证了每周五六天的业务时间。这对长期荒废了业务的广大学者来说，真是久旱逢春雨。1973年，我从丽江调到昆明，主要协助方国瑜先生完成名著《纳西象形文字谱》的编撰工作。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重新学习古文字学的理论和历史知识。先后花了七年时间，两人逐字逐句反复推敲琢磨，几经修改才付梓，倾注了先生毕生的心血，我也从中受到难忘的教益。与此同时，服从组织的需要，我担任了历史所民族、地方史研究室主任兼党总支委员，工作量加大，不仅要重新学习民族史、民族学，翻阅大量文献和资料，还要做学术组织、审稿等工作。《云南少数民族》一书就是在前人基础上由这一时期历史所领导和全室同志共同努力完成的集体项目。其中，我也尽了一份微薄之力。在这期间，以民族语文为基础，服从单位研究工作的需要，发挥自己的专长，我也探索语言文字研究如何结合历史文化研究的路子，其代表作是《从象形文东巴经看纳西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几个问题》的长篇论文。它以丰富的崭新的语言文字资料与汉文献资料相结合，详细论证了纳西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汉族的历史联系等三个问题。1980年，该文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和重视，同年夏天在承德被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四届连选连任至今。这前后，丽江地区恢复了纳西东巴经的翻译抢救工作。根据社会的需要，我参与了酝酿成立东巴文化研究室的筹备工作。在方国瑜先生与和万宝同志的书面倡议下，后经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批准，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我被任

命为顾问。随后，我国著名哲学家、时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教授专程到丽江考察东巴文化。我有幸陪同前往，并在他的提示启发下，根据当时东巴文化研究刚刚起步的条件和需要，学习宗教学知识，写成《略论纳西族的东巴教和东巴文化》这篇长篇论文，刊于1983年《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促进了东巴文化研究的发展。此后，它又收入两种论文集，一种刊物予以转载，社会效果较好。1982年，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提交论文《纳西族东巴经语言试析》，进一步打开了从语言文字研究东巴文化的路子。又如近几年来，为了配合纳西族地区用民族文字扫盲和开展双语教学的社会需要，我不仅亲自下去讲课，还编写出版了五本民族语文读物和《纳西语基础语法》一书。这都是根据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普及工作。从中可以看出，个人的学术活动，要根据社会的需要服从所在单位的任务。这样才能充分施展个人的专长。随着东巴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外学术界都很自然地提出了值得商榷的若干学术问题。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的学者，不能漠然视之，不能采取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超然态度。为了祖国学术的繁荣和这门学问向深层发展，近两年我撰写论文《炎黄、古羌与纳西东巴文化》，坚持纳西族主要渊源于古羌南下说；参加海峡两岸中华民族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纳西族原始巫教古文化之渊源》，是我参与学术界对“纳西文化源头”讨论的论文，提出了原始女巫“杞”、男巫“桑尼”到祭司“东巴”的发展序列，并对国外学术界否认人类曾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观点作出自己的回答。近作《历史上纳西族的“拇瓜”制度》，吸引学术界研究唐、宋以来纳西族的历史的成果，填补了纳西族历史研究中的空白点。总之，我体会到：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和所在单位的任务来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即服从社会的需要；如此，才能充分发挥自己

的民族语文专长，自己的学术成果也被社会所公认，被学术界称为“当代中国民族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民间文学家”。

三、做一个老实人

做老实人是基本的做人之道。只有做老实人，才能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对集体和社会有所裨益。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我体会做学问和做人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即所谓“文如其人”，特别是在年轻时候要多磨炼做人之道。以此带动做学问之道。其核心是做一个老实人，对社会、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要老实、忠心，对组织、同志和群众要老实、诚心，做学问亦要老实、虚心。总之，要从思想上、作风上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老老实实的学者。现在，我已逐渐迈入垂暮之年。回顾41年的治学之路，尽管自己身上和墨迹之中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还存在不少毛病和缺点，但我经常以“做一个老实人”来要求自己，即纳西话常说的“喜笃”！其一，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警惕在工作上和业务上以自己的失误而有损于党和集体的事业；其二，忠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老老实实在地干，要有一种历史赋予的使命感，而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其三，对牵涉有关个人的问题，诸如职务、职称、工资、待遇等，抱“知足而常乐”的态度，不过分去考虑它，更不能追逐它！其四，学而后知不足。41年来，我虽然在学术上有了一点成绩，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自己写下的东西，资料性的多，在理论体系和科学规律上没有多少建树。在当今时代条件下，仍有一个重新学习和更新知识的任务，要“做到老，学到老”，保持晚节，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老实人。

1992年春节